

新文科背景下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的探索^{*}

李岩松

提要: 新文科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推进亟需更多关键土著语言人才。本文在剖析新文科、关键土著语言人才等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阐述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的原则,并结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人才培养实践探讨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路径,期望对同类研究提供一定启示。

关键词: 新文科; 关键土著语言人才; 人才培养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new liberal arts, the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 need of more critical aboriginal language talent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and critical aboriginal language talents, and then probes into the principles of cultivating critical aboriginal language talents. Integrating the practice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approaches to critical aboriginal language talents cultivation, hoping to shed light on similar studies.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critical aboriginal language talents; talents cultivation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12(2022)01-0002-06

1. 引言

自 2019 年启动的新文科建设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引领人文社科创新发展,当前已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在 2021 年 11 月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共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讲好“一带一路”故事,需要更多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掌握关键土著语言的非通用语人才。外语学科和外语类院校作为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如何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明确人才定位、加强价值引领、突出交叉融合、优化课程体系、创新培养模式等,值得深入探索。2021 年 12 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年会上,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下简称广外)等外语类院校结合新文科要求,从不同维度阐述了多语人才培养的理念与实践。譬如,北外倡导实施“‘101’非通用语振兴计划”;上外坚持“跨通融”理念,培养“多语种+”卓越人才;广外提出强化融合创新,培养复合型复语型国际化人才。为进一步对接国家战略,本文基于新文科、关键土著语言人才的内涵,结合上外外语人才培养实践,探讨关键土著语言人才的培养原则与路径,期望对同类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2. 新文科与关键土著语言人才

2.1 新文科

为落实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和“新时代高教 40 条”要求,2019 年“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启动,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2020 年发布的《新文科建设

^{*}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关键土著语言文化通识课程体系建设研究”(编号 AFA180013)的阶段性成果。

宣言》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文科教育发展之路,坚持尊重规律,坚持立足国情,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分类推进。新文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健全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樊丽明在“新文科建设高峰论坛 2021”上发言指出,新文科建设要切实做到“三个结合”,即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紧密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紧密结合。由此可见,新文科建设在学科发展定位上坚持国家与社会需求导向,强调本土性和创新性,强化价值引领和基于交叉融合的学科共生。在发展路径上,新文科建设倡导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优化专业结构、推动模式创新、打造质量文化等,以促进传统文科的拓展升级和新兴文科的萌芽发展。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外语学科须突破语言文学本体研究,探索学科内外的交叉融合。李宇明(2020)指出,语言学作为“研究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科学,不能局限于“语言文学”,而应当是横跨理工文的综合学科,依照“新文科”思路发展的学科,能够促进知识经济发展、新基建发展的学科。蒋承勇(2020)认为,无论中国文学研究还是外国文学研究,都始终离不开学科间性基础上的跨学科互涉,而且这种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研究的不断提升、拓展与深化,又是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创新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外语学科可在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交叉融合的基础上,探索与理学、医学、工学、农学等的交叉,以立足本土的真问题为导向,依托课程、教材、教学媒介、教师、教育环境等,融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于一体,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卓越人才。当然,因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

2.2 关键土著语言人才

为明确关键土著语言人才的概念,我们需要了解关键语言和土著语言的内涵。李艳红(2015)指出,关键语言是指由政府认可的,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学发展和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语言和方言。陈立鹏和张靖慧(2015)认为土著语言的使用关系到土著居民的自我意识、民族身份认同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程彤和邓世平(2019)认为土著语言是特定国家或区域的土著居民所用,在历史发展变化中已经形成鲜明语言、文化特征并延续使用至今的语言。基于以上定义,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提出关键土著语言即符合国家战略需求,与我国外事外交、经济外贸、文化教育、国家安全等密切相关,承载土著居民传统文化的语言。“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民心相通需要掌握关键土著语言的人才。

从“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视角来看,关键土著语言人才不仅精通语言,而且具备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实务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体现了对外语人才的政治素质、语言能力、专业素养和话语能力等方面的要求。2021年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多语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从中可见一斑。

为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倡议,2021年中共上外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以培养能够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实务的卓越人才为使命,其关键素养即全球话语能力融合了“政治定力、语言能力、学科能力和话语能力”。关键土著语言人才亦应具备全球话语能力,即在世界眼光中保持自己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精通或掌握一门联合国工作语言(如英语、法语)

与一门土著语言(如马来语、印地语、土耳其语),具有较强跨文化沟通能力,能用多语进行交际互动、管理沟通、组织协调等;能运用历史、文学、教育、法律、经贸、金融等某一领域知识;具备话语能力,能讲清、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方案,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只有具备政治定力、语言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等四种能力,才能成为符合“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需求的全球治理人才。

3. 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原则

结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要素和外语学科特点,笔者从人才定位、培养理念、教学实践、教学评价等角度提出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原则。

第一,坚持“四力”导向原则。就人才定位而言,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应能参与全球治理与全球实务,而政治定力、语言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为其关键素养。面对新文科建设,学界应充分考量外语学科兼具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属性的定位,考量外语学科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特点,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复语和复合型人才,如外事外交人才、高级翻译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等。Szanton(2002)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特点概括为精深的语言学习、运用方言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密切关注地方性历史与观点解读、通过细致的观察来验证和批评宏大的理论等。

第二,坚持学科交叉融合原则。就培养理念而言,应在坚持外语本色的基础上,顺应新文科的交叉融合趋势,一方面在语言类专业内部交叉融合,在课程模块、教学资源、教学环节等方面体现跨语种、跨文化的复语特色;另一方面探索关键土著语言与管理学、工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农学、医学等的交叉融合,试点微专业、本硕贯通等。

第三,坚持“AI+”赋能教学原则。就教学过程而言,应充分体现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信息技术对教育的赋能,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人才培养环节,重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模式,创设体验式、交互式、情景式学习空间,拓展学生的关键土著语言与相关领域知识,培养学生的多语能力与创新能力。

第四,坚持多元动态评价原则。就教育教学评价而言,应进一步丰富评价主体,创新评价形式,在科学、客观、公平的基础上借鉴国际评价标准,同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评价体系。

4. 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路径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围绕新文科背景下的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目标,笔者结合上外的外语人才培养思考与实践,探讨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路径。

4.1 科学规划布局,强化价值引领

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需要科学规划布局。从国际视角来看,有必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维度明确关键土著语言的分类、分布等;从国内视角来看,各院校特别是外语类院校和综合类院校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结合学校定位和区位优势,明确关键土著语言专业的分布、层次、数量等,并特别关注师资、教学资源、学生就业等因素,解决好师资短缺、学生就业方向相对狭窄等问题。就上外而言,目前授课语种达 49 种,近五年来增设匈牙利语、波兰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等语种专业,同时开设“拉丁语”、“基础梵语”、“乌尔都语基础”、“基础马来语”、“爪哇语入门”、“普什图语入门”、“塔吉克语”等多门课程,分层分类培养关键土著语言人才,服务中国“走出去”、中外文明互鉴等发展需求。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高校应始终服务国家战略,落实课程思政,践行立德树人。为深入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1年教育部评定课程思政示范课程699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699个、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30个;开展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构建多维度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由此可见,坚持价值引领、做好课程思政对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上外作为“课程思政”的首创高校之一,积极推进外语教学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实现课程思政全专业、全过程、全方位覆盖。学校不仅落实构建课程链、开设课程思政公开课、建设课程思政资源库等举措,还打造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版本为重要素材的系列外语教材,建设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数据库综合平台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多语种对照查询平台等,从而丰富相关课程思政资源,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改革,提高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质量。

4.2 推进交叉融合,优化课程体系

新文科背景下,学科交叉融合已是必然趋势。外语学科不仅与中文、历史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与医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互动不断加强。譬如,上外在外语+国际传播、外语+国际政治、外语+国际经济、外语+国际法、外语+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展有益探索,成立脑与认知科学应用重点实验室,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自主增设了“国别与区域研究”、“语言数据科学与应用”等二级交叉学科点,推动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多语种+”和“AHG+”(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组合发展,以及数据科学与语料库研究等的交叉融合。

课程是落实“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理念的“最后一公里”(吴岩2018)。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有必要围绕培养目标,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开发相关学科的微专业,以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政治定力、语言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等多元能力。首先,倡导交叉融合课程理念,结合《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等教学标准与大纲,丰富专业核心课程和培养方向课程,在公共课程的通识教育课程模块中融入技术赋能类、跨学科研究方法类、社会科学类课程等,如数字人文理论与研究方法、人工智能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借助辅修、双学位等开发微专业,提供核心课程。其次,分层分类设计课程,丰富课程形式。既要根据教学目标、学生需求等打造线上、线下、线上线下融合、虚拟仿真、社会实践“金课”,也要结合学生学段、专业等差异开发关键土著语言文化等的基础与进阶课程或同源语课程,注重教学内容的螺旋递进性、专业性与学术性,还要实现课程本硕博打通,跨院系、跨学校、跨区域共享。第三,优化课程内容。一方面,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或经教材专家组审核认定的原版教材,也可搜集汇总相关资料自编教学手册等。从关键土著语言学习现状来看,鉴于相关师资和教材较少,汇聚优质师资、编写遵循教学规律的教材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根据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环境、学生需求等对现有教材进行二次开发,通过搜集外刊、音视频等拓展教学资源并提高其实用性。最后,注重课程的通识性与国际化。一方面,开发线上线下融合的外教多语种拓展课或多语文化带等,以创设多语环境,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参加海外暑期工作坊、实践项目或到目标语国家进行田野调查等,提高关键土著语言能力、学科能力与话语能力。

4.3 注重智慧教育,提升创新能力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大中小学开展的线上教学促进

了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而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以及爱课程、学堂在线、Blackboard 等教学平台的应用推动了“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基于智能技术的智能化、网络化、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有助于促进教育的精准化,提升教育质量。

吴岩(2019)指出外语教育不要抗拒技术,也不要藐视技术,要重视技术,重视变革。就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而言,应坚持智慧教育,为教师赋权,为学生增能,通过人机协同优化教学过程、促进学生发展。一方面,注重信息技术融入教育教学,鼓励师生开发 AR/VR 课堂、翻转课堂等,参与构建全球国别区域知识资源库,提高运用信息技术设计课堂等能力。另一方面,注重大数据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倡导基于人工智能的交互式学习,实施个性化教育,鼓励学生运用各类 App 进行自主学习、交流互动、合作探究,促进其认知与情感发展。此外,创设体验式学习情境,开展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使学生通过担任博物馆、国际会议志愿者等挖掘关键土著语言的人文价值,提高自身思辨能力与跨文化沟通能力。比如,上外师生建设 29 个多语种门户网站,编译“防疫汉外翻译词汇表”,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共建“中共建党历史多语种语料库”,开发语言博物馆体验式学习活动,从而提升学生的关键土著语言能力与话语能力等。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有必要全面推行学业导师制,为学生配备高水平导师或导师组,指导他们开展“顶天立地”的研究,既上接学术前沿,又立足本土需求,通过参与外语学科领域相关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提高学科能力。

4.4 坚持育人核心,打造质量文化

2018 年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和 2020 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都强调了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这也契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亦提出要改进学科评估,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淡化论文收录、引用率、奖项等数量指标,突出学科特色、质量和贡献。笔者认为,无论学科评估还是专业建设,都应坚持育人核心,打造质量文化,切实培养服务国家战略的人才。这一理念也可应用于关键土著语言人才质量保障。

关键土著语言专业一般隔年或者每 4 年招生,师资也相对不足。为确保人才培养质量,首先倡导师资多元化,提升教师质量。就教师来源而言,既可聘用国内外语专业人才,也可聘用海外教师,还可从政府部门、跨国公司、高校、科研院所等聘请兼职或者短期项目制教师。就教师角色而言,本科层面包括专业理论教师、实习实践导师、学业生涯规划指导教师、双创指导教师等;在研究生层面,导师/导师组、项目组专家等均应发挥积极作用,通过科研项目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同时,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出台青年教师专业发展计划,提升其教学与科研能力。譬如,上外依托 2 个国家级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计划)引进优秀的外国专家教师,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其次,加强教育教学督导。根据《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高校要进一步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導體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教育督导作用。应进一步落实学业预警机制等,动态督促学生学习,并建设学生学业发展数据库,通过电子档案袋等分析学生培养质量,探究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规律。最后,构建动态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可结合成果导向教育(object-based education)理念,运用现代教育技术,通过线上教学平台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了解其学习发展轨迹。教学评价应将量化与质化评价相结合,倡导诊断性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4.5 创新体制机制,探索人才实验区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外语教育在培养参与全球治理与全球实务、国家亟需的高层次人才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在新时代、新文科、大外语、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如何落

实交叉融合理念、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外语教育提质创新发展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外语类院校也基于办学传统做出积极探索。比如,上外于 2015 年成立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卓越学院,陆续开设了多语种高级翻译、多语种国别区域、多语种国际组织、多语种外交外事人才实验班;在研究生层面继续培养“多语对”高端翻译人才,打造国别区域研究特色研究生项目,设立了“多语种+”全球新闻、涉外法律、欧亚文明研究、世界语言政策等硕士生实验班。北外于 2017 年成立了北外学院和国际组织学院,广外于 2019 年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翻译+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3 个国际组织创新班。这些探索有助于提高外语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国家战略。

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实践有必要在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个性化需求的基础上,依托实验班、创新创业项目等有序展开。首先,对标国家战略,明确培养理念,结合用人单位(如国家部委、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需求,突出复语、复合型特色,设计个性化培养方案。其次,通过跨语种、跨专业、跨学科、跨院系、跨学校、跨国界实现协同创新,从师资、教学资源、教学媒介、教学方法、评估模式等方面保障教学质量,实现订单式培养。特别要注重依托科研院所、跨国企业的专业和行业导师,提升人才的创新能力与提供智库服务的能力。最后,扎实调研,动态调整培养方案,充分了解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采取相应对策,同时对人才培养实验的成果及时反思、凝练,实现成果理论化与普及化。换言之,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培养需要基于教学改革,产出科研学术和实践应用成果,以发挥社会辐射作用。

5. 结语

交叉融合的新文科发展、深入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更多关键土著语言人才。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外语学界应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基于学科布局和专业特色,坚持立德树人,丰富课程体系,优化培养模式,注重智慧教育,打造质量文化,不断探索创新,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多语种+”卓越人才,切实助力民心相通,促进中外文明互鉴,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Szanton D L. Introducti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In Szanton D L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Disciplines* [C].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22.
- [2] 陈立鹏,张靖慧. 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双语教学政策:内容、特点及启示[J]. 民族教育研究,2015,(4):124-128.
- [3] 程彤,邓世平. “一带一路”沿线关键土著语言专业课程设置研究[J]. 外语界,2019,(6):62-69.
- [4] 蒋承勇. 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创新[J]. 外国文学研究,2020,(3):61-72.
- [5] 李艳红. 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国家安全诉求[J].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5,(2):1-10.
- [6] 李宇明. 语言学与“新基建”、数字经济[J]. 外语界,2020,(4):5-6.
- [7] 吴岩. 建设中国“金课”[J]. 中国大学教学,2018,(12):4-9.
- [8] 吴岩. 新使命 大格局 新文科 大外语[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19,(2):3-7.

作者单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办公室,上海 200083